

三國志集解

白帆 著

初探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三國志集解

初探

ISBN 978-7-5308-7584-1



9 787530 875841 >

定价:28.00元

《三国志集解》初探

白 帆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志集解》初探/白帆著.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308 - 7584 - 1

I. ①三… II. ①白… III. ①中国历史 - 三国时代 - 纪传体
②《三国志》 - 研究 IV. ①K236.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9288 号

责任编辑: 方 艳

责任印制: 张军利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蔡 颢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022) 23332695(编辑部) 23332393(发行部)

网址: www.tjkjcs.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77 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内容提要

卢弼《三国志集解》一书的内容,大致上可分为校勘、考释与议论三大类,其中最为充实而前人研究相对薄弱的是考释部分。本书就围绕《三国志集解》的考释部分展开,着重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地理、职官与史实考释来进行具体地剖析,并纂辑与创见两种类型,分别进行讨论。

本书认为,《三国志集解》的考释以地理部分成就最为突出,体例严谨,内容充实,无论是纂辑还是创见,均有极高水平,而其最突出的特点一在于带有鲜明的军事地理色彩,二在于以“明地望”作为手段来进行史实的考辨。

职官考释是《三国志集解》中较为薄弱的部分,体例上的不严谨导致徵引中出现多处的疏漏与重复,而著者的创见大多针对具体细节,在系统地提炼与论述方面乏善可陈,较为薄弱。

史实考释的范围,包罗甚广,情况也比较复杂,难于像在考释地理时那样订立严谨固定的体例,因此这一部分的考释大多随宜进行,没有一定之规。同样由于其复杂的情况,史实考释的质量有些参差不齐,良莠互见。这一部分胜于前人的突出特点在于纂辑中广泛地使用了互见互证,对《三国志》原书与裴注的资料给予了充分地重视与利用。

通过对地理、职官、史实三个部分考释内容的具体分析,并结合《三国志集解》对清人学术成果的总结情况,本书认为《三国志集解》一书的注疏特点有二,一是继承了裴注所开创的史注传统;二是坚持以援引为先、旁参众书,不求文必己出的注疏理念。而该书注疏中体现出的不足之处有三点,一为徵引有疏漏与重复的现象;二为全书内容轻重不均,水平参差不齐;三为在观念与方法上未能与时俱进,时代特色较为淡薄。

本书的研究,在方法上突破了前人定性研究的现状,转为定量研究,采用计量统计的方法作为基础,辅以举例分析、分类比较与归纳综合等方法,对《三国志集解》的注疏内容、理念、体例、方法进行系统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该书的优劣之处与学术地位作出全面、准确地评价。

总的来说,虽然《三国志集解》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与全书的贡献相比,瑕不掩瑜,该书的确是在《三国志》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出著作,在中国史学名著的集解汇注之书中占有一席之地。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三国志集解》的研究现状	(1)
第二节 本文的内容与研究方法	(5)
第一章 卢弼与《三国志集解》简介	(14)
第一节 卢弼的生平与著述	(14)
第二节 《三国志集解》之前的《三国志》研究史	(17)
第三节 《三国志集解》的概况	(29)
第二章 《三国志集解》的地理考释研究	(33)
第一节 《三国志集解》地理考释的基本情况	(33)
第二节 《三国志集解》地理考释的纂辑与创见	(46)
第三节 《三国志集解》地理考释的贡献与特色	(59)
第四节 小结	(62)
第三章 《三国志集解》的职官考释	(65)
第一节 《三国志集解》职官考释的基本情况	(65)
第二节 《三国志集解》职官考释的纂辑与创见	(76)
第三节 《三国志集解》职官考释的缺憾之处	(86)
第四节 小结	(90)
第四章 《三国志集解》的史实考释	(92)
第一节 《三国志集解》史实考释的基本情况	(93)
第二节 《三国志集解》史实考释的纂辑与创见	(101)
第三节 《三国志集解》史实考释的特点	(121)
第四节 小结	(132)

第五章 《三国志集解》的学术地位	(135)
第一节 《三国志集解》对清人学术成果的总结	(135)
第二节 《三国志集解》的注疏特点	(151)
第三节 《三国志集解》的不足之处	(162)
第四节 《三国志集解》的学术贡献与地位	(178)
结语	(190)
参考文献	(192)
致谢	(211)

绪 论

第一节 《三国志集解》的研究现状

陈寿作《三国志》文笔简洁,称为信史,享有盛名。南朝宋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鉴于其书“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的事实,将作注的重点放在史料的补充上,“上搜旧闻,傍摭遗逸,……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而对于音义训诂等方面的注疏重视程度不及史实。自裴注问世至于清朝的一千五百年间,历代学者对《三国志》这一史学名著及裴注的研究、考订成果极多。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近人卢弼纂成了《三国志集解》一书,是为《三国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书博采众家成果,精加校释,误者正之,缺者补之,既为《三国志》作注,也为裴注作疏,将前人特别是清人对《三国志》的研究成果几乎包罗无遗,是一部总结性的著作,颇益後学。

《集解》自问世以来,便获高度评价。当时学者胡玉缙为之作序,赞扬是书“引称浩博,辨正详明”^①,又称“精深浩博,在长沙王氏两《汉书》之上……考徵议论,兼擅其胜,地理犹精”^②。柴德赓则称是书“用功至勤,徵引至繁,可谓应有尽有”^③。吴金华将其视为与裴注并列的、《三国志》疏解工作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

① 胡玉缙《三国志集解序》,《三国志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页。

② 卢弼《覆胡绥之先生书》,《三国志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页。

③ 柴德赓《史籍举要》,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第61页。

“无论是史事的议论和考订,还是文字的校勘和训诂,都足以与王先谦的两汉书注解并驾争先。迄今为止,这部集旧说之大成并有所开拓的巨著,仍旧是关于陈《志》和裴《注》的最详注本”。^①

然而,与《集解》在学术研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相比,它所得到的关注度显得很不相称。今人研究《三国志》,往往对《集解》多有引用,但专门探讨《集解》学术成就和得失之处的著述却寥寥无几。

关于《集解》的学术著作,主要内容都是介绍《集解》并评价其优劣所在。如卞孝萱《〈三国志集解〉的学术价值》^②、涂宗涛《卢弼和他的〈三国志集解〉》^③和钱剑夫《卢弼〈三国志集解〉校点记》^④三文,是目前比较全面地介绍《集解》学术成就的文章,而赵幼文《〈三国志集解献疑〉初稿序》^⑤则主要指出了《集解》的不足之处。

卞孝萱《〈三国志集解〉的学术价值》从校勘与注释两个方面,介绍了《集解》的成就。在校勘方面,该文认为卢弼的贡献有两点,一是汇集前人校语,二是自作校勘,后者又包括改字、补字、删字三种情况,多为前人所未发的独到成果。在注释方面,卢弼既为《三国志》作注,又为裴注作疏,将前人的成果收集整理,并发表自己的见解,不仅为读者带来方便,也增加了《集解》的学术价值。该文还特别提出了《集解》注释中关于地理的考订,认为最为精

① 吴金华《三国志校诂前言》,《三国志校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1—2页。

② 卞孝萱《〈三国志集解〉的学术价值》,《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第1—6页。

③ 涂宗涛《卢弼和他的〈三国志集解〉》,《天津师大学报》,1995(3),第65—69页。

④ 钱剑夫《卢弼〈三国志集解〉校点记》,《文献》,1985(1),第51—75页。

⑤ 赵幼文《〈三国志集解献疑〉初稿序》,《〈三国志〉校笺》,成都,巴蜀书社,2001,第2049—2052页。

当,卢弼凭其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为考沿革、释今地两个全局性的问题订立了体例。

文中还归纳了卢弼辨析《三国志》及裴注失误之处的种种情况,将《集解》的考订分为针对《三国志》与针对裴注两类,前者又分为纠正《三国志》叙事自相抵牾、纠正《三国志》叙事错误和纠正《三国志》用语不当三种,后者分为纠正裴注判断错误、纠正裴注所引书叙事错误和纠正裴注所引书掩盖史事真相和纠正裴注所引书用语不当四种情况。在充分肯定《集解》学术价值之余,该文也对它提出了一些可商榷之处,如在版本方面,《集解》不以宋绍熙本为底本而以金陵翻刻汲古阁本为据,杂引各本互校,只记异同不定是非,使人无所适从。在引书方面,忽略了《梁书》《建康实录》等史书和《晋书音义》、萧常《续後汉书》所附音义等注音释义方面的著作。

涂宗涛《卢弼和他的〈三国志集解〉》,对卢弼的生平与《集解》的特色做了简要的介绍,认为《集解》有五个方面的特色:第一,广搜各种版本进行校勘。第二,凡裴注所无者,博采众家之说,分刊于相关句下。所引资料力求其全,即使明知为误说也照录。第三,引大量资料为裴注作疏,对裴注有误或有疑处,则随时纠正。第四,加按语进行辨正的内容十分丰富,而且精到之见不少。既有文字校勘,也有对某家之说加以补充者,或对某家之说加以反驳者,对两家不同之说则判明谁是谁非。对某些历史事件也直接进行评论。第五,发微抉隐。某些地方表现了著者犀利的目光,可称发千古之覆。在充分肯定《集解》之余,该文也指出了此书存在的一些不足,如在搜罗资料方面,虽然十分丰富,但也并未包罗无遗,而在辨正方面,虽然有精到的一面,但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评说也时有陈腐之嫌。

钱剑夫《卢弼〈三国志集解〉校点记》是在点校整理《集解》之后对其进行总结评述的札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点校本

《集解》的书前,也收录了这篇文章,但删去了其中列举《集解》援引书目的部分。该文在简要介绍点校整理《集解》的体例之余,总结了《集解》一书的得失,计其得者为四端:纠缺谬、订误说、正地理、辨名物。该文认为,《集解》徵引既繁,因此所援引考证、辩说质疑及文字训诂之失也在所难免,他将这些失误总结为六端,一是徵引之失,二是考证之失,三是训诂之失,四是注说之失,五是质疑之失,六是句读之失。

赵幼文《〈三国志集解献疑〉初稿序》指出了《集解》在搜集前人学术成果、校勘、作注和辨正等几方面的不足之处^①,而在《〈三国志集解〉辨正》中更是条列并辨正了大量《集解》的疏漏与舛误。

此外,吴金华在《易氏〈三国志补注〉评述》一文中,也对《集解》的成就与优劣所在作出了评价,认为该书基本完成了“汇集前人特别是清代学者的有关著述”这一工作,在“史料的补充、史事的考辨、史文的评点和注释方面为读者提供新的参考资料”方面虽然做了努力但空白甚多,而在“搜集善本进行会校,并参考其他文献特别是古类书里的异文加以考订,使之成为附有多种重要版本信息的新校本”这一方面内容单薄。^② 这是比较恰当而中肯的评价。

概括而言,目前学术界对《集解》的评价甚高,认为其成就在于博采众家,徵引繁富,辨正精当,时发新意。而对《集解》不足之处的评述,基本集中于底本选择不善、资料搜罗不全、注疏考辨时有舛错三个方面。

除了对《集解》进行评价之外,后来学者也为弥补其薄弱与不

① 赵幼文《〈三国志集解〉献疑初稿序》,《三国志校笺》,成都:巴蜀书社,2001,第2049—2052页。

② 参见吴金华《易氏〈三国志补注〉评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第117—132页。

足之处而进行了许多考辨与补正。如赵幼文《〈三国志集解〉辨正》^①《三国志校笺》^②;卞孝萱《〈三国志集解〉补正》^③;吴金华《三国志校诂》^④等。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本学者今鹰真的《〈三国志集解〉补》^⑤,该文分为六篇,陆续刊登于《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文学)》,该文认为《集解》徵引仍有疏漏,共计对《三国志》及裴注原文补充了1266条相关而为《集解》所忽略的文献资料,但并无作者自己的辨正或意见。

第二节 本文的内容与研究方法

《三国志》一书,是具有经典地位的中国古代史学名著之一,而卢弼《集解》又是至今为止《三国志》的最详注本与集大成之作。正是由于《三国志》与《集解》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因此围绕它们所展开的研究,至今仍有价值与必要性。通过上一节中对《集解》研究现状的总结与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学术界对《集解》的研究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宗旨在于为《集解》拾遗补缺,而以《集解》本身作为对象来进行的论述,又多为定性而非定量研究。因此,现有的《集解》相关研究还不够全面,存在着进行深入探索的空间。

本文的研究内容,将以《集解》的考释部分作为主要对象来展

① 赵幼文《〈三国志集解〉辨正》,《中华文史论丛第二十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263—281页。

② 赵幼文著,赵振铎等整理《〈三国志〉校笺》,成都:巴蜀书社,2001。

③ 卞孝萱《〈三国志集解〉补正》,《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0),第14—20页。

④ 吴金华《三国志校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⑤ [日]今鹰真《〈三国志集解〉补》(一)一(六),连载于《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文学)》35号,1989,第249—258页;38号,1992,第255—272页;39号,1993,第275—292页;40号,1994,第255—274页;41号,1995,第215—228页;43号,1997,第227—242页。

开。

所谓的考释,是指《集解》对《三国志》及裴注中的内容进行补充、订正、辨析和阐发的工作。除此之外,《集解》还包含校勘与议论两类内容。校勘,即汇集前人校勘成果并搜集各种版本进行会校与考订;议论,即在考释的基础上对史实、人物、原书及裴注价值、书法、史观等方面发表见解。在这三类内容中,以考释的部分所占篇幅最大,包罗范围最广,价值也最为突出,而今人对这一部分的研究也相对而言较为欠缺和粗疏。基于这一前提,并考虑到论文容量与自身学术能力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将主要针对《集解》的考释部分来展开。至于《集解》的校勘部分,虽然也有许多努力,但成果并不突出,即使与同时同类之书易培基《三国志注补》相比,亦显逊色。对于《集解》在校勘方面的缺陷,今人已有不少专门的订补之作,以吴金华《三国志校诂》与《三国志丛考》二书最为精实。况且与校勘相关的研究,需要建立在广泛搜集、比对大量善本的基础之上,此非笔者如今所能做到。鉴于进行校勘研究缺乏必要条件,又有学者珠玉在前,难于增色,故在本文之中暂从阙略,以待将来有条件时进行。与此类似,议论部分也非《集解》工作主要的努力方向,书中收录前人议论虽多,但夹杂了不少与史论无关的内容,如《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年曹操征汉中凯旋之事,裴松之引王粲五言诗作注,中有“徒行兼乘还,空出有馀资”一句,而《集解》引何焯言“如此与作贼何异?何如昌黎‘士饱而歌,马腾于槽’八字为有《雅》《颂》风格”。^① 似此语句,虽属议论,但无关史事。又如《魏书·邓哀王传》:“文帝宽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②《集解》引何焯言曰“仓舒之死,正

① 卢弼《三国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93页。

② 卢弼《三国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161页。

在军败赤壁之年,故尤愤不择言。”^①评论所言,亦无关该书注疏宏旨。《集解》中类似的议论之句为数不少,时有自乱体例之嫌,同样不是全书的学术贡献与特色之所在,因此本文亦不进行详细地论述。

在研究中,本文将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地理、职官、史实三个方面来进行详细剖析,对《集解》的注疏理念、体例、方法、成果、优长、不足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

作为一部集大成之作,《集解》在内容的构成上与一般的著述之作有所区别,虽然也包含有作者自身的创见,但更大的篇幅都用于纂辑前人的成果。而前人在研究《集解》时,往往以其注疏的对象是《三国志》原文还是裴注来作为分类的标准,却忽略了《集解》是由纂辑与著述两种不同的内容所组成这一事实。实际上,《集解》的注疏无论是方法、体例还是理念,都并不因其所针对的对象是《三国志》还是裴注而有所不同,但纂辑与创见本是两类不同的内容,不加区分地将它们夹杂在一起进行讨论,不利于对《集解》的正确评价。前人多以注疏对象的不同为据来对《集解》的内容进行分类讨论,而忽略了其中纂辑与创见之间的区别。有鉴于此,本文将把《集解》的内容分作纂辑与创见两个部分来分别讨论,以明晰该书在上述两方面不同的价值与成就。

另外,在《集解》成书之前,前人特别是清人已有大量关于《三国志》的研究成果,其中亦不乏网罗繁富之作。作为后来居上的集解体作品,《集解》在注疏的理念、方法等方面自有特点,而现有的研究对此较为忽略,未见详细、具体的分析。本文将采取对比的方法,通过《集解》与清人类似著作之间的比较,来研究该书在注疏理念、纂辑方式等方面的特点及其相较前人的进步程度究竟如何,从而正确地评价该书在《三国志》研究史中的地位。

① 卢弼《三国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163页。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一改前人所普遍采用的定性研究方法,转为定量研究,以计量统计作为最基础与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以坚实的原始材料和精确的统计数字为基础,使得本文立论更为坚实可靠,结论更为全面系统。

遍观前人已有的成果,在对《集解》进行研究时都以举例分析的手段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即罗列《集解》的优劣之处,并在各条优点或不足之下举一二例子作为证明。唯涂宗涛在《卢弼和他的〈三国志集解〉》一文中,采用了一次计量统计的方法,所统计的仅仅是《集解》卷首“魏书一”“武帝纪一”两个标题与全书正文第一句“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後”及裴注第一条,共两个标题,四句话,《集解》注疏十处。涂宗涛之文中虽然采用了计量统计,但所统计的范围实在过小,正如其文中自言的“解剖麻雀”式的研究,相对全书来说,仍然是举例分析的性质。

举例分析固然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具体到《集解》一书的研究上,单纯使用这一方法存在着明显地局限性。因为该书是到目前为止《三国志》相关研究中篇幅最大的一种,篇幅既广,内容又多,研究者无论提出何种观点,都多少能够在《集解》宏大的篇幅中找到例子来作为支持。采用这一方法进行研究,得出的成果不过是举例个数多寡上的差异,相对于《集解》的篇幅来说完全无法穷尽其材料。况且,在缺乏精确计量统计作为基础的前提下,单纯用举例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很难断定所举例子在全部材料之中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是个例还是普遍情况,由此得出的结论难免说服力不足或有片面之嫌。当然,在阅读过程之中随手札记,而後将若干则相关内容连缀成文,是前辈学者读书与研究的惯常之法,而这一习惯从如今的学术研究方法论来看,确实显得有些粗率与随意。同时,对于《集解》这样一部大书来说,想要完整、全面地了解其真实面貌,计量统计无疑是最为科学准确的方法,但其

宏大的篇幅使得全面计量统计的工作十分繁琐困难,这或许也是前人主要采用举例分析作为研究手段的原因之一。

有鉴于前人因方法上的局限而造成的研究空白,本文的研究方法将突破定性研究的旧法,采取定量研究的方法,以精确的计量统计作为最主要、最基础的研究手段,力求穷尽《集解》材料,最全面彻底地了解《集解》注疏全貌,并以此作为全文研究的基础,这是本文在方法论上与前人研究之间的根本区别,亦是本文最大的价值所在。

在对《集解》进行切实精确的计量统计之基础上,本文也将结合举例分析、分类比较与归纳综合等研究方法,对《集解》的注疏内容、理念、体例、方法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对《集解》的优劣之处与学术地位作出准确的评价,力求超越前人的研究水平,取得新的进展。

文中所据的《集解》版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为钱剑夫点校整理的断句标点本。该本将《三国志》原文与裴注分段,《三国志》原文为宋体,裴注为楷体,低一格排,而将《集解》以小注形式集中列于段后,原处标以注码,较为便于统计,故此采用。同时,本文采用了中华书局 2006 年影印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来进行核对与参考。

另有说明如下。

第一,本文在进行计量统计与引文时以较为便利使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点校本(简称上海古籍点校本)为据,中华书局 2006 年影印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简称中华书局影印本)只作为参考。由于本文徵引例证较多,而所使用的《集解》均出自同一版本,因此凡是举例引用《集解》之处,除第一次于脚注中注明版本信息与页数外,之后均在所引文字之后直接加一括号标明页数,不再一一加注,对断句标点则间出己意,不另注明。其馀零星引用、所引用内容出于不同版本或另有考证论述之时,则仍旧以脚注注